

西方文明的独特性

当研究世界史上的诸问题，触及到近代欧洲文明的产物时，人们必然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并且只有在西方文明中才出现了一种文化现象：它（正如我们所设想的那样）原是沿着一条具有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的路线发展的，这一事实究竟应归于哪些复杂的情况呢？

科学只有在西方，才真正处于一个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健全的发展时期。至于经验主义学说、宇宙问题和生活问题的见解以及一些极为深奥难解的哲学和神学学识，并不仅仅出现在西方，虽然在神学方面，系统化的神学之能得到充分发展必须归功于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基督教，因为在伊斯兰教和少数印度教派中仅仅存在着一些不完整的教义而已。简言之，丰富的知识和敏锐的观察在其他地方都已存在，首先存在于印度、中国、巴比伦和埃及。只是巴比伦和某些其他地方的天文学还缺少数学基础，巴比伦是从古希腊学得数学的，结果其天文学得到了较前更惊人的发展。印度的几何学则缺少推理验证方法；推理验证乃古希腊学者的另一学术研究成果，后来的力学和物理学都发源于此。印度的自然科学虽在观察方面颇有发展，但缺少实验方法，

而这种方法除了在古代稍有开端之外，它像近代实验室一样，从根本上说乃文艺复兴的产物。所以，医学，特别是印度的医学，虽在经验技术方面有较高的发展，但缺乏生物学特别是生物化学的基础。至于合理的化学，则除了西方以外，所有其他文化地区都尚属空白。

高度发达的中国历史学唯独缺少修昔底德的研究方法。诚然，马基雅维利在印度可以找到他不少的先辈，但所有亚洲的政治思想都无不缺少一种可与亚里士多德的系统方法相匹敌的思想方法，并且，也确实缺少理性概念。无论印度（弥曼差学派）的各种启示或近东的各种编集成典，内容广博的法律或印度和其他国家的法律书籍，都缺乏严格系统化的思想形式；而这种思想形式对于罗马法以及受它影响的西方法律的理性法学都是不可缺少的。还有像教会法规那样的结构，也仅存在于西方。

上述情况在艺术方面也同样如此。其他民族对音乐的欣赏力可能比我们所具有的更高，绝不会比我们低。各种各样的复调音乐已经遍布全球，许多乐器协奏和多声部合唱也存在于其他许多地方，我们所有合理的音调音程也都为人们所了解并用来计算。但是，理性的和谐音乐，既多声部又和谐：以具有第三和声的三和弦为基础的题材音调结构；不用线间术语来解释而用（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和声来解释的半音和等音；以弦乐四重奏为中心的管弦乐队和以管乐和奏的组织；低音乐器伴奏；使近代音乐作品的写作和演奏成为可能并得以流传的记谱法；奏鸣曲、交响曲、歌剧以及作为这一切的手段的基本乐器风琴、钢琴、小提琴等。所有以上种种 仅存在于西方 虽然标题音乐、音调 诗歌、

声调变化和半音阶曾作为表达手段存在于各种音乐传统之中。

在建筑方面，弓形尖顶作为一种装饰手段在古代和亚洲某些地方都已被人们采用，弓形尖顶和十字形尖角拱顶的联合结构在东方大概也不是鲜为人知的；但是哥特式尖拱建筑作为分散压力的手段，……尤其是作为巨大纪念性建筑物的结构原则并扩展为一种雕塑和绘画风格的基础，像中世纪西方艺术品所体现出的那样，这在其他地方都未见出现。我们的建筑技术基础原来自东方，但东方没有解决圆顶问题，没有掌握各种艺术的合理形态，如在绘画上应合理利用线条和空间透视；这些都是文艺复兴时期为我们创造的。中国很早便有了印刷术，但专为印刷而设计，并且只有通过印刷才可能制成的印刷品，特别是报纸和期刊，最早仅出现于西方。各类高等学校，有些甚至在表面上同我们的大学或至少学院相类似，在中国和伊斯兰国家都曾设立过，但是，由经受过培训和有着专业知识的专职人员对科学进行合理的系统的和专业性研究，在我们文化上达到现今这样的优势地位 就这点来说 它仅存在于西方。首先它在培训主管人员上，也就是在培养现代西方国家的柱石人物和西方经济生活中的柱石人物上，是行之有效的。柱石式的人物现在已形成了一种模式；这在过去，仅属一种设想或建议，从来也没有对社会秩序起到像今天这样重要的作用。当然，行政主管人员甚至各个专业中的主管人员都是各个社会中非常古老的成分，但是从来没有任何国家、任何时代曾经有过像现代西方国家那样，将其全部生活包括生活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各项条件都完全地、绝对地托付给受

过专门训练的主管人。社会日常生活的最重要的功能已逐渐掌握在经过技术、商业特别是法律方面训练的政府官员手中。

在封建阶级中存在着政治和社会集团组织，一直是很常见的。但是，在西方意义上的封建国家仅在我们的文化中才为人知。通过定期选举代表而产生的议会，和由群众领袖及政党领袖担任各部部长并向议会负责的政府，甚至更为我们所独有；尽管在作为对政治权力能施加影响和对政治权力能有所控制的组织的意义上，全世界一直有着政党存在。实际上，一个国家本身，从它具有一部合乎理性的成文宪法，有着一套合乎理性的法律，并有着一个对法律规章严肃负责且由一批经受过训练的官员予以执行的行政班子这一总的意义上来说，也只有西方才有，尽管其他国家在别的方面同西方国家十分接近。

同样看法对近代生活中最重要的力量——资本主义也是适用的。占有欲即追求营利、赚钱，最大限度地赚钱同资本主义本身并无关系。这种冲动经常存在，并且至今仍然存在于侍者、医生、马车夫、艺术家、娼妓、贪官、士兵、贵族、十字军骑士、赌徒以及乞丐之中。人们可以认为，这对于世界上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中各式各样的人都是共同的，不管这一客观可能性出现在哪里，或曾经出现在哪里。贪得无厌同资本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更谈不上是资本主义的精髓所在。资本主义倒可能是和节制这种不合理冲动，或至少对其作较合理的缓和相一致的。不过资本主义同追逐利润、并且是通过连续不断的、合理的和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经营手段来追逐不断更新的利润，也都是是一致的。一

所资本主义企业一定要这样做，因为在具有全部资本主义特征的社会秩序中，它不充分利用机会获取利润，那它注定会遭到灭亡。

现在，让我们对我们的某些术语下个较往常更精确的定义。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这个词，我们可定义为：一种通过利用交换的机会以获取利润的活动，也即通过和平的获取利润机会的活动。如果是通过强力获取利润，那将是一种与此完全不同的行径。

在资本主义利润是合理地取得的场合，合伙人的每一行动无不以计算为基础。为了达到上述概念的要求，最为重要的一点便是：要使经济活动能与实际收支状况相适应，不管这种经济活动是以多么原始的形态出现。那么在此意义上，资本主义和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一些企业，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已取得资本主义核算合理化的企业，在世界所有文明国家中都已存在，就我们所能掌握的资料判断：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地中海的古代、中世纪和近代无不存在。这些活动并不只是孤立的冒险，它是完全靠资本主义经营的不断更新和持续运转而进行的经济进取活动。然而，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特别是贸易并不一直与我们现有的相同，它们互不联系而基本上是由一系列个体经营所构成。甚至大商贾的经营活动也只逐渐地才获得（同分支机构等的）内部协调。总之，资本主义企业和资本主义企业家，不仅指偶然存在的，而且也包括正规的在内，都是非常古老的而且在过去就极为普遍的。

然而 现今西方已对资本主义作了发展 既在量的增长方面，也在类型、体制和方向方面。商人，无论是批发商还

是零售商，无论是从事地方经营的商人还是参与外贸的商人，全世界无处没有。各种贷款已经出现，具有多种功能的银行也已存在，它们至少可与 16 世纪的银行相比……每当公共团体筹集现款资金时，贷款者就会出现，像在巴比伦、古希腊、印度、中国和罗马曾经出现的那样。他们曾为战争、海上侵略活动、各种合同和建筑施工项目提供费用。在海外政策方面，他们起着殖民地开拓者的作用，也起着拥有奴隶或拥有直接或间接强迫劳动力的种植园主的作用。他们还包出产业、官职，最重要的是包出税收。他们还包为竞选中的政党领袖和内战中的外国雇佣兵提供费用。他们的活动已在极大程度上具有了不合理性和投机性，导致凭借强力获利，特别是直接从战争中攫取战利品，或以对居民收税的形式进行剥削。

推销商的资本主义，大规模投机者的资本主义，特许权追求者的资本主义，尤其是与掠夺性战争密切有关的资本主义，即使在现代西方国家，也都具有这种印记。还有少数，仅仅少数一部分大规模国际贸易，也具有这种印记。过去是如此，现今仍旧如此。

然而，除此之外，西方国家又发展了一种其他任何地方都未曾出现过的特殊形式的资本主义，即（形式上）自由劳动的合理资本主义组织。在别的地方，人们仅能看到这种组织的萌芽形态罢了。甚至不自由劳动组织取得较大程度的合理性也仅在种植园，西方古代的奴隶作坊极为有限。在庄园、庄园作坊以及使用农奴劳动的家庭工业中，这种资本主义形式是不很发达的。此外，已确切证明使用自由劳动的发达的家庭工业，在西方之外仅有少数孤立事例存在

.....

然而，与正常市场相协调而不是同政治的或不合理的投机谋利活动有关的合理工业组织并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唯一特性。资本主义经营的近代合理组织，如果在其发展中不具备另两个重要因素 将是不可能的：一是商业同家庭的分离 这在近代经济生活中占完全统治地位；一是与此密切相关的合理的簿记。.....人们会发现在远东、近东和古代也有着拥有他们自己记帐方法的资本主义合伙组织的发展。但是 同近代商业经营的独立性相比 那些都仅是微小的开端。主要的原因是 这种独立性所不可缺少的条件 即合理的商业会计和公司同个人财产在法律上的分离，在那时不是完全不存在便是尚仅仅开始发展。

然而 西方资本主义的这一切特性 归根结蒂只有从它们同资本主义劳动组织的结合上才显示出它们的重要性。甚至一般称之为商品化的东西——即流通证券的发展、投机合理化、股票交易等——都同这种劳动组织有关。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合理的资本主义劳动组织 所有这一切 在竟然有此可能的情况下，将不会对社会结构和近代西方所有与此有关的具体问题有着同等重要性。精确的计算——此乃一切东西的基础——只有在自由劳动的基础上才有可能。

正如，或正因为人们不知道近代西方国家之外还存在着合理的劳动组织，他们也不知道有什么合理的社会主义。确实 我们能在别的一些地方发现这样一些例子 城市对经济的控制 食物供给政策 重商主义 君主的福利政策 定量分配 政府对经济生活的调节 保护主义以及放任主义理论

（如在中国）。世界上各种各样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验也已成为人们所知：家庭共产主义或军事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指埃及），各种垄断性卡特尔和各种消费者组织。尽管我们能够到处发现城市、公司和同业公会的种种市场权力以及城乡之间的各种法定区别，但是除了西方之外，都不存在公民概念，同时除了近代西方之外也不存在资产阶级概念^{①*}。同样，因为不存在处于正规纪律约束下的合理自由劳动组织，所以，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不可能存在的。债权人阶级同债务人阶级之间、土地所有者同贫无立锥之地者以及农奴或佃农之间的阶级斗争，商人同消费者或同地主之间的矛盾冲突，都以各种各样的复杂形式在各地产生。但是，即使西方中世纪的投机商同其工人之间的斗争，在其他文明世界也不过存在一些发展不完全、与此类似的东西而已。至于像近代大型工业企业家同自由工资劳动者之间的冲突，任何地方都未曾有过。对于我们来说，世界文化史的中心问题不是资本主义活动任何形式的发展之类 如冒险家的类型 或贸易中的资本主义、战争、政治 或作为赢利源泉的管理等，而是具有合理的自由劳动组织的有节制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起源。这个问题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起源及其特点的问题：这一问题肯定与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劳动组织的起源紧密相连，但也不完全是一

必须记住，“公民”和“资产阶级”最初仅具有“城里人”的含义。（S. A）

* 凡斯坦尼斯拉夫·安德烈斯基教授为本书加的注解，其后面都标有他的名字缩写（S. A）。我们加的注解后面标有“译者”。没有标明注者的地方，可能是原文作者自己加的注。——译者

回事。因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早在资本主义所独具的近代形式发展之前便已存在，虽说它仅存在于西方文明之中。

资本主义的近代西方形式有赖于科学，特别有赖于以数学和精确合理的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另一方面，这些科学的发展和基于这些科学之上的技术的发展，现今从它们在实际的经济应用中所获得的资本主义利益得到了重大刺激。当然，西方科学的起源不能归因于这样的利益。算法，甚至具有十进位的算法和代数都早在印度使用。十进制原是由印度发明的，但它只有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才充分地得到利用；在印度，它没有发展到近代算术或簿记。不过数学和力学的产生也不是由资本主义利益所决定的。然而对于人民大众生活条件如此重要的科学知识在技术上的应用，肯定受到经济动机的推动；这种动机对西方科学知识在技术上的应用具有特别有利的作用。这种推动力是从西方社会结构的特性中得到的。因此，我们得提出一个问题：它既然不是所有的部分都同等重要，那究竟是从这个结构中的哪些部分取得这一推动力的呢？

在这些部分中，合理的法律结构和合理的行政管理结构肯定具有巨大的重要性。因为，近代合理的资本主义不仅需要生产的技术手段，还需要一种可靠的法律制度和一种依据于正式规章的行政管理制度。如果没有它们，一种不正常的、阴暗的、投机的和单纯以营利为目的的资本主义以及其他各种为政治所左右的资本主义便可能会产生，但都不会产生在个人首创的、具有固定资本和计算精确性的合理经营里。只有在西方，这样的法律制度和这样的行政

管理制度才能被用来作为经济活动的结构。所以，我们必须进一步探究这种法律究竟来自何处。因素之一，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利益反过来为受过正规法律专门训练的法官阶级在法律和行政管理方面居于优势地位开辟了道路，不过这并不是唯一的力量，甚至也不是主要的力量。这些利益本身并未创制这种法律。在这一发展中，倒是一些与它们完全不同的力量起了作用。为什么资本主义利益在中国或印度未曾起到同样的作用呢？为什么那里的科学、艺术、政治或经济发展没有沿着西方所特有的合理化道路前进呢？

所有这些问题，关键的一点是西方文化所具有的特定的而且与众不同的唯理主义。通过这一术语人们可以理解许多与此有很大区别的事项，这在以后的讨论中将会反复地显示出来。例如神秘主义沉思合理化这一点，是指一种态度而已，它从生活的其他范畴来看，显然是不合理的，其不合理一如经济生活合理化、技术合理化、科学研究合理化、军事训练合理化、法律和行政管理合理化等。而且其间每一个领域，都可以通过与此迥不相同的最终价值和目的方法使之合理化；同时，在一种观点看来是合理的东西，也许在另一种观点看来却是不合理的。因此，形形色色的合理化存在于各种各样的生活范围和文化区域中。如用文化史的观点去突出其差别，就必须了解哪些方面已合理化了，并且在什么方向上合理化了。所以，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应对西方合理主义过去和现在的独特性的起源加以确定和说明。在每一试图作这样的说明时，都必须承认经济因素所具有的根本重要性，特别须对经济条件加以考虑。但与

此同时 对相反的关系也必须予以考虑到。因为 虽然经济合理主义的发展 部分地依赖于合理的技术和法律 但它同时也被那些进行某种实际合理经营活动的人的能力和气质所决定。当精神障碍妨碍了这些活动时，合理的经济行为的发展则同时也会碰到严重的内部阻力。神怪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伦理的义务观念，过去始终是对行为发生影响的最重要的构成因素之一。

资本主义在古代世界的失败

西欧各国的定居方式和东亚文明中所常见的定居方式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它们之间的差异可以概括如下：在欧洲，转向定居意味着从以饲养牛（特别是为了获取牛奶）为主的经济向以从事农业为主的经济转化，养牛仅作为次要的因素而继续存在；与此相反，在亚洲，则存在着从广大的，因而是游牧式的农业向不饲养奶牛的园艺农业转变。不过这种比较是相对的，可能不适用于史前时代。不管这种变化从什么时候开始，它却导致了许多基本特性的出现。因此，在欧洲民族中，土地私有总是和划分小型集体中的公共畜牧场并加以分配而联系在一起。在亚洲，这种发展则没有出现，所以，人们仅在西方才看到这种最初形式的农业公社团体——例如中世纪日耳曼民族的村落公社^①和公地。这种形式并非不存在于亚洲，但纵使有所存在，却具有完全不同的经济功能。由于这种原因，在东亚农村组织中，公有财产的作用（除非它起源于近代——大概产生于财政

在德国农村，牧地是公有的。

调节)明显地与欧洲同类财产的作用完全不同。人们在东亚看不到同拥有畜群和因拥有畜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相联系的“个人主义”。

所以(,主要在欧洲 但不以欧洲为限 我们在西方人中到处都能见到处于这种发展开端的某些特点。据我们判断:通常,当可供开垦土地因不断从重养奶牛向重耕植土地转移而日趋减少之时,固定农业便告开始了。不仅西北欧是这样,南欧和近东也基本上是这样。

然而 在史前时代的近东(美索不达米亚)和非洲唯一主要文化中心——埃及,这一发展却受到了具有绝对重要性的河流灌溉系统的巨大限制。从理论上讲,灌溉农业本可直接从动物驯化前的园艺农业后期便逐渐形成,但在这些地区,灌溉却使它们的全部经济具有一种在历史上十分独特的性质。

与此相对照,希腊的和罗马的一些公社——尽管古代史料都突出用牛来从事劳动,而不是为了牛奶这一点——所具有的农业体制都基本上同中世纪欧洲的公社相接近,然而广大群众为了使土地得到充分发展,都纷纷依附于土地,无法再服兵役;结果另一部分摆脱了农业的劳动者便形成了职业军人阶级,他们转过来对这些无法招架的广大群众进行剥削以饱私囊。从上述这一时期起——历史又踏上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以经常性训练和实践为先决条件的军事技术发展成为一种职业,有时是上述历史发展的结果,有时又是上述历史发展的原因。我们知道,在欧洲中世纪早期,这一过程导致了“封建制度”的建立。在古代仅能发现与中世纪封建制度相类似的制度萌芽;这种萌芽与领地和

封地的结合或罗马德意志分封法，都不存在真正的相似之处。但把“封建制度”概念仅限于用在这个制度的中世纪形式，那是不必要的，而且也是不聪明的。东亚文明和印第安文明都有一些制度，这些制度根据其功能，我们认为其性质基本上是封建的。有那么一些社会制度，其基础是一个献身于战争并为皇家服务的统治阶级，他们凭借特权占有土地，收取地租，并强制依附于他们的手无寸铁的人们为他们服劳役^①。对这样一些社会制度的特征，不用封建制度的概念来加以描述，是没有道理的。

因此人们可以把在埃及、巴比伦所实行的行政分封和斯巴达的政治体制称之为封建的。封建制度各种形式之间的差别来自对武士阶级的组织方式和经济支助方式的不同。一种可能性是身为地主的统治阶级在全国范围内都有分布，其情况一如中世纪欧洲所呈现出的封建制度“个人主义”形式，其起源可追溯到古代晚期。

然而，在古代地中海，特别是在古代希腊出现了另一种形式，产生出许多早期的“封建城市”，它们都是些为职业武士所驻扎的据点。这种“城市封建制度”显然不是古代封建制度的唯一形式，但对处在政治发展早期、后来成为“古典”政治文明中心的那些城市却直接施加了影响。

从海外输入外国优良军事技术，这在古代南欧已经出现，它们是从海上，同时是通过把被统治的至少在地理上是十分广泛的沿海地区组成一个商业系统来实现的。封建统

这个定义也包含有像土耳其、拜占庭或俄罗斯帝国那样的集权政治结构的意思，并且接近马克思所附加给这个术语的意义。

治阶级最初一直是从这种贸易中获取利润的阶级。所以，古代封建发展的特征导致了封建城邦的形成。另一方面，在中世纪早期，通过陆路传到中欧的军事技术的发展使中部欧洲发生了变化。当中部欧洲产生封建制度的时机已告成熟时 因为缺少像古代所存在的那种发达的商业 那里的封建制度主要以农田为基础，从而出现了庄园制。因此 这种占统治地位的军人阶级结合在一起的纽带基本上便是个人间效忠的关系。而在古代，这恰恰是城市公民身分的更为强韧有力的纽带。

古代城市封建制度和贸易经济之间的关系使人回想起中世纪的种种变化发展 城市自由工业的兴起 贵族统治的衰落“，城市经济”和“庄园经济”之间的潜在斗争以及中世纪晚期和近代初期货币经济发展引起的封建国家的灭亡等等。然而 这种与中世纪和近代种种现象的比较 看起来似甚有理 其实在很多方面是极不可靠的 并且 实际上都经常是弄清问题和理解问题的障碍，因为这些相似点太具欺骗性了。古代文明有其与中世纪文明和近代文明截然不同的特点。其经济中心 直到罗马帝国兴起，一直位于西方海岸和埃及以及近东的河流区域。虽然古代的贸易，不论是地区间的还是国际间的都面广而利厚，然而除少量重要的偶发交易外，它在商品贸易的相对数量上却落后于中世纪晚期。确实，古代贸易品种繁多，诸如低贱金属和贵重金属无不包括在内，而且在原料品种方面也比人们想象的更多。不过，古代土地贸易只能在某些特殊之点和特定时期能同中世纪晚期相比较。甚至在对外贸易方面，大多日用消费品也仅在少见的政治或经济扩张时期才真正起到重要作

用；特别以在雅典和后来的罗得岛、埃及以及罗马建立起了垄断性港口为然。

巴罗克* 根据公元前 401—前 400 年希腊皮雷埃夫斯港所收到的关税额估计，该港当年的贸易额是 2000 塔朗特（古货币单位 大约合 1300 万金法朗）。因为关税是商品价值的 $1/50$ 而收税额为 30 或 36 塔朗特 所以商品的总值约 2000 塔朗特。这仅是皮雷埃夫斯港的单独情况，并且紧接在伯罗奔尼撒战争** 之后发生，而货币购买力的差价又未予补偿 尽管如此 这 2000 塔朗特却约合今天希腊王国的外贸额 总量为 1.3 亿—1.4 亿金法朗 的 $1/10$ 。这一金额确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如果人们假定，在实际上关税额仅合成交商品价值的 $2/100$ 而其他税收又不包括在内 这样，人们对上面所计算出的数字肯定是会接受的。然而，学者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却不一致。

罗德岛人认为 提洛岛在自由港建立之前 所进口的关税为 100 万德希马克 约合 140 雅典塔朗特) 这是较上一笔更为巨大的税收。他们岛对整个希腊王国实际上确都拥有巨大特权；但在提洛岛被辟为自由港之后，他们仅收到 15 万德希马克税款。对这一问题我们能否如此来看：由于这笔税收数字具有明显的“官方”性质，其可靠性有些令人怀疑。另一个有资料可据的例子是：对雅典的同盟国征收

* 巴罗克 1854—1929) 德国历史学教授。——译者

** 伯罗奔尼撒战争（前 431—前 404 年）这是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的奴隶主贵族势力和以雅典为首的奴隶主民主派诸城邦之间的一场战争，以雅典的失败而告终。——译者

即大约 1900 年。(S. A.)

5/100 的海关贸易税，却并非对雅典和其最大岛屿间征收的贸易税。此种关税是作为某一税收的替身来征收的；据贝洛奇估计，雅典人自己期望此项税收能达到 1000 塔朗特。然而，我不能接受这一估计，因为贝洛奇从修昔底德斯著作中所引用的那段材料，肯定太简单，根本不足以作为决定此项金额数量的有力依据，并且，这个数字也不能与在皮雷埃斯港所收纳的 30—36 塔朗特相一致。另外，通过增加 5/100 的进口税就能免交某种贡金，看来也是没有意义的。

一笔较重要的商业交易，实际上也许是古代最大一笔有记载可查的不受国际控制和资助的私人自由贸易，那便是在维斯佩基安*的统治下，有一笔从印度输入埃及的货物价值 5.5 千万古罗马钱币（1.6 千万金法郎）。有关这一点的资料显然是可信的。

有一点必须注意 古代贸易的一切统计数字中 不仅包括物资商品，还包括奴隶在内。由于奴隶可以运来运去，他们是经济扩展时代的商业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如果奴隶们的身体好 在和平时期 其价格是很高的。

在古代，凡是依赖进口粮食过活，而且经常如此的地方，就必须导致国家干预，因而在制度和政治上也必然带来十分重要的后果，因为私人贸易被认为是不能充分保证国家的粮食供应的。

当然，不仅仅是中世纪国家，而且重商主义的君主们，甚至专制政治的沙俄，也都有其宗旨同古代的相类似的粮

* 维斯佩基安（9—79），罗马皇帝。在位期间为公元 69—79 年。——译者